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关注乡村全面振兴的几个问题

杜 鹰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举措，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调“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篇大文章，做好这篇大文章，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振兴乡村特有功能

城市有城市的功能，乡村有乡村的功能，推进乡村振兴，并不是要把乡村建设得和城市一样，而是要把乡村特有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一般地讲，乡村具有三大功能，有效供给农产品、提供生态公共产品、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村的三大功能面临弱化风险。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方面，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首次突破1.4万亿斤。但也要看到，由于需求侧消费升级和供给侧成本上升，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部分农产品供求矛盾趋紧，这突出表现在蛋白类食物的供求缺口不断扩大、进口量不断增加。据测算，2000年至2022年，我国以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从96.7%下降到76%，大约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

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2019年末全国耕地面积为19.18亿亩，相比10年前的“国土二调”时减少了1.13亿亩，确保实现2030年耕地保有量保持在18.25亿亩以上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成为环境污染的重要成因。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2005年至2023年，我国三种粮食亩均生产成本从425元增加到1281元，年均上涨6.4%，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方面，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农村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流失，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乡村活力不足问题突出，不仅带来“谁来种田”的问题，同时也带来传统农耕文化衰落的风险。

促进乡村振兴，关键是要把乡村所特有的、全社会发展进步须臾不能离开的同时又面临弱化风险的功能振兴起来，这样才能更好把握乡村振兴的本质。

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

2000年至2024年，我国粮食产量从4.6亿吨增加到7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从365公斤增加到500公斤，但为什么蛋白类农产品进口量不断增加，以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从需求侧看，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直接消费的粮食减少了，由粮食转化来的肉禽蛋奶等食物消费量大大增加。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后一营养级获得的能量约为前一营养级能量的10%，其他能量都在转化过程中散失。肉蛋奶是后一营养级，前一营养级是玉米、豆类等粮食。这就是为什么随着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粮食反倒显得不够、国家粮食安全的数量底线也随之上升的生物学原因。

从供给侧看，农业进入高成本阶段。我国人多地少水更少的资源禀赋，再加上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导致农产品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成本上升很快，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这是造成大量农产品进口的又一重要原因。

适度进口农产品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把农产品的供求平衡完全寄托于国际市场，不仅不现实，而且会受制于人。因此，必须立足国内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和农产品有效供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各地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做法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农业作为第一车间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农产品有效供给为主，不限于粮食和初级产品，还包括加工转化后的食品；另一类是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代表的田园综合体模式，这种模式提供的主要是服务产品。这两种模式分别指向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但从全局和普遍意义上讲，第一种模式更值得重视和提倡。一方面，乡村振兴无论如何都应把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全国真正能发展农文旅的村庄占比并不高，大多数乡村更适用第一种模式。当然，这两种模式不是互相排斥的，如果能融合在一起更好。

重视乡村价值再发现资源再开发

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改变乡村传统的资源要素利用方式、推动生产要素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跃迁并重新优化组合的过程，这离不开乡村价值的再发现和乡村资源的再开发。比如，通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还可以带动整个农业生产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59∶1，较上世纪大幅提升，但与发达国家4∶1左右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说明我国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还大有潜力。通过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业态，也可以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农村电商的迅猛发展就是一个典型代表。2023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2.49万亿元，比2014年增长近13倍。电商不仅增加了农村就业和农民收入，而且还带动农业转型升级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旅游也是农业多种功能拓展、乡村多元价值发现的代表性领域。相比城市高密度、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乡村的田园风光、清新空气、传统文化和悠闲情趣成了稀缺资源。这说明，只要适应新的需求，改变乡村资源的传统利用方式，乡村产业振兴就有广阔前景。

实现乡村价值的再发现和资源的再开发，有三个重要前提条件。第一，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子。没有城市生产要素下乡，没有城市现代生产方式的引入，乡村资源的再开发会很难。我国目前已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要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为城市赋能乡村振兴创造更好条件。第二，大力培育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带动农业农村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升级。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仅仅靠增加要素投入已远远不够，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依靠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更好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第三，要着力培育农村经营型人才。当下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是懂市场、善经营、会管理的经营型人才，要着力培养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资源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的经营型人才，更好满足乡村产业振兴的需要。

因势利导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

乡村产业的开发，离不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很有必要。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通常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方式，必然产生与集体和农户的利益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影响项目成败，而要真正处理好三者利益关系并不容易。

在实践中，龙头企业、集体、村民三者的利益联结大体上有四种方式。一是“订单农业”方式，龙头企业给农户下订单组织生产，农户按要求交售农产品，双方按合同价格结算，是比较单纯的市场关系。二是租地建基地方式，龙头企业把农民土地流转过来建立生产基地，企业负责基地的开发和经营，农户除了拿到租金外，还可以在基地务工拿到劳务收入，这是比“订单农业”联系更紧密的一种方式。三是“利润返还”方式，比如浙江的丝绸公司，采取保底价收购蚕茧，再从公司盈利里拿出一定比例返给集体和农户，这种方式更加稳定了龙头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四是股份合作制，龙头企业以资金、技术、机器设备入股，集体和农户以土地入股，组建利益共同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是利益联结最紧密的一种方式。

选择哪种利益联结方式是市场行为，要由农户和企业选择，不可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目前在实践中，龙头企业与集体、农户大多采取松散的利益联结方式，采取紧密型利益联结方式，特别是股份合作制的少而又少。这既有企业的原因，也有农民的顾虑。企业认为，已经付给农民租金和薪金，没必要再分红，也不愿集体和农户参与企业决策。同时，不少农民更看重眼前利益，对入股合作不感兴趣，不愿与企业共同承担经营风险，也不愿形成利益共同体。

尽管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是我们的政策导向，但真正实行起来是有条件的，至少有三条：一是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批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农户谁也离不开谁；二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合作社，就可以降低与企业打交道的交易成本；三是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同时也要培育农民的契约意识。因此，发展紧密型利益联结要讲究条件，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水到渠成。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着乡村振兴的成色和质量。过去村集体的产权界定不清晰，所以产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涉及的是非土地的经营性资产。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是要将集体的经营性资产清产核资、划定股权，确定成员权，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全体村民，组建股份合作社。财产关系清晰，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才能促进集体经济更好发展。

但要注意，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有合作性，又有封闭性。这种封闭性表现为，即便股份制改革之后，村民的股份仍然不能在社会上流转，只能作为分红的依据。所以，与企业股份制改革相比，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本质上有很大区别，关键在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成员不能流动，成员的股份不能流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不能破产。从法律规定上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被民法典明确列为特别法人的一种，公司法不适用于村集体经济。

解决农村集体经济怎样才能和市场有效对接等问题，需要探索创新，可以考虑由改革后的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拿出一块资产另外建立一个股份公司，这个公司是有限责任的，股权可以流动，公司也可以破产。前提是要实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项改革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

增

王永贵 马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当前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之首，凸显出提振消费的关键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消费呈现全球化、共享化、融合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要顺应趋势，持续增加消费新供给，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注入强劲动能。

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高，2013年至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8311元增至41314元，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613亿元，2024年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增至123元。要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民生政策，可考虑进一步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大补贴力度，为“银发经济”增后劲。释放劳动、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潜力，持续优化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加快构建以技能和贡献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丰富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促进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扩大入境消费和进口消费。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2024年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优化，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近年来，我国进口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进口消费持续推动消费升级；入境游持续升温，入境消费需求快速扩张。2024年，我国货物进口18.39万亿元，预计继续保持第二大进口国地位，进口消费平稳增长；2024年前三季度入境中国游客合计9462.83万人次，同比增长78.8%，入境消费快速增长。要大力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扩大入境消费和进口消费，支持首发经济发展，引领全球消费趋势，不断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深化人工智能研发应用，推动国内消费平台全球化布局，链接国际市场新需求和国内科技创新应用。

培育智能化新型消费。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商业化应用，有力推动传统产品和服务升级，催生绿色化、智能化新动能。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汽车、家居等传统产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增长迅速。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已突破7157亿元。预计到2026年，国内虚拟现实产业总体规模将超3500亿元。要深入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进一步提升政策效果，把更多智能消费品纳入支持范围，持续释放数字消费潜能。积极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持续推广“营销智能+消费”，不断提升消费能级，以高质量消费引领产业创新升级，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形成绿色低碳消费方式。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绿色产品供给、促进绿色消费，有助于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促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前，在吃穿住行用等领域，绿色食品、绿色包装、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能源正深度融入商品和服务消费各类场景，绿色消费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绿色消费需求迅速增长。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为1288.8万辆，同比增长34.4%；销量为1286.6万辆，同比增长35.5%，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0.9%。2023年绿色食品有效用标产品6.37万个，国内销售额达5856.57亿元。然而，绿色消费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如绿色产品标准认证不够规范、辨识度不高、渗透度有限、供给动力缺乏等。要进一步用好“两新”政策，加强废旧资源循环利用，鼓励简约适度、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的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绿色产品高质量供给，发挥财税、金融和投资政策引导作用，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发展，加速构建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管理体系与碳标签认证机制，促进绿色消费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发展高品质精神文化消费。高品质商品消费和以服务为载体的高品质精神文化消费，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渗透融合，有助于推动产业融合和业态更新，拓展产业边界。2013年至2024年，我国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从1398元增长到3189元。融合消费业态蓬勃发展，文旅娱购游等跨界消费日渐普遍，文化场景消费普及开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电竞游戏和二次元文化等数字文化深度融合的消费，逐步发展成Z世代的消费新风尚，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研学、演艺等加速融合形成新型消费业态。冰雪经济爆火，《黑神话：悟空》游戏带动文旅热度，《哪吒2》成为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冠军，贵州“村超”“村BA”吸引全世界目光。要持续提升文化服务和产品供应机制，支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和合理利用，丰富数字文化内容产品和服务供给，强化文化与科技融合，培育更多具有创新、跨界等特点的新型融合消费业态，增强供需适配性。

（作者分别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适应新形势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卢 伟 李沛霖

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工作，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明显增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时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形势新要求，要提前谋划，加快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区域协调发展不是简单要求各地区经济发展达到同一水平，而是引导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能源资源富集地区等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形成不同地区优势互补、分工合理的良性竞争合作发展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旨在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所有地区的共同发展，因而区域战略和政策的实施需更好平衡区域内和区域外协调发展目标。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在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人民生活保障、创新和开放平台布局等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提升劳动力要素配置水平。

“十四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稳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区域间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接近。2020年至2023年，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均GDP比值由1.66下降至1.63，南方和北方地区GDP占全国比重保持稳定。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差距分别下降0.024和0.021。中西部地区高速公路新增里程占全国近八成，公路新增里程占全国近九成，铁路新增里程占全国近六成。截至2023年，东部、中部、西部义务教育生师比基本持平，生均用房面积差距明显缩小，中部和西部地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已超东部地区。

“十五五”时期，我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形势。一是区域通达程度提升将推动空间聚散格局深入演进，重点城市群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将强化优势地区经济一体化能力，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沿黄交通廊道、内河航运网络的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将显著降低东中西板块间和板块内部城市群间的流通成本。二是人口将向重点都市圈和城市群进一步集聚，“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有约5000万人从农村迁移至城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七大城市群将承载全国78%的人口增量，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将成为人口聚集的主力区域，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将持续面临人口外流和老龄化加剧的双重压力。三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经济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为部分具备比较优势的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机遇，但也存在通过劳动力替代效应拉大区域发展差距的风险。四是对美经贸合作占比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或将受到关税和产业外迁的冲击，而随着中欧班列的高质量运行、中老铁路向泰国延伸、中吉乌铁路联动西亚和南欧市场，西部地区将成为衔接欧洲—东南亚两大板块产业链条、经贸网络和要素流动的枢纽和前沿地带。

下一步，应顺应“十五五”时期交通、人口、开放发展新条件新形势，努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支撑全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其一，依托重要交通廊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宏观上，依托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陇海—兰新线等东西向轴线、京广—京哈等南北向轴线和内河航运网络，充分释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动力源地区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辐射带动潜力，强化重要交通、能源、水利、信息基础设施对沿线综合赋能作用，有效促进生产和消费循环，形成更多高质量经济带。中观上，依托日益完善的城市群内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有序打造网络型经济区，深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分工协作，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实现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微观上，依托“轨道上的都市圈”建设，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在都市圈尺度内形成更可持续的“中心—外围”关系，实现发展方式优化。

其二，顺应人口分布格局变动提升区域城市治理能力。提升人口重点流入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完善“人地钱”挂钩机制，强化超长期国债对农业转移人口义务教育、门诊医疗和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能力，更好实现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和战略腹地建设为契机，系统提升东北和西部地区产城互促水平，促进人口回流。以完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等为重点支持晋冀鲁豫和中西部部分人口自然负增长和常住人口负增长地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以基础设施适老化更新、形成多元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等为重点，鼓励长三角、成渝等深度老龄化地区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其三，强化创新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建设北京、上海、港深等国家级创新型区域经济综合体，先行先试深化科技体制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国际化、容错试错、多元化的创新生态，在助力提升国家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中发挥更大作用。引导超大特大城市、核心城市更好发挥对中小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创新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创新要素资源由集聚为主向集聚和扩散并重的转变。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地区强化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科学城、科创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布局。

其四，有的放矢开辟区域协同开放新空间。支持沿海地区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举措向中西部地区复制推广。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效率，推动东、中、西通道全线畅通，深化“一单制”“一箱制”应用实践，提高西南西北地区联动开放水平。拓展沿江沿海的“T”字形开放格局，向北沿中欧班列强化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能力，向南沿中老铁路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强化联动中南半岛和东盟地区的能力。深化向西向南开放合作，推动中老泰铁路、中吉乌铁路建设，优化境内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生态和模式，逐步形成内畅外联、共建共享、具有国际示范意义的经济走廊。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本版编辑 秦 悦 美 编 吴 迪
来稿邮箱 jjrbll@sina.com